宗教文化对鼎湖山森林资源保护的影响^{*}

魏 平 温达志

(中国科学院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 肇庆 526070)

摘 要 根据现有的文献史料和保护区内历代留存的碑刻 ,探讨了不同历史时期内鼎湖山宗教文化的兴衰 ,历代僧侣对鼎湖山森林实行禁伐保护的管理措施 ,以及对森林资源保护和森林群落演替的影响。从而提出 ,仅就文字记载来看 ,鼎湖山代表性植被——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群落受禁伐保护始于 1633 年 ,迄今已有 366 年的保护历史 ,其中庆云寺僧人实行禁伐保护的历史长达 319 年。宗教文化是鼎湖山森林群落及生物多样性保存完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森林资源保护 ,季风常绿阔叶林 ,宗教文化 ,鼎湖山

Effects of religious culture on forest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 Dinghu mountain , Guangdong / WEI Ping , WEN Da-Zh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some inscriptions on the steles found in Dinghu Mountain Biosphere Reserve ,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religious temples of Dinghu Mountai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and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of the forest adopted by monks , and the effects of the religious culture on the forest community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 presented. From the recorded writings ,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representative vegetation in Dinghu Mountain—South Asian subtropical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fed forest was initiated in 1633. Thus this vegetation has been protected and managed for 366 years , of which , 319 years was done by the monks in Qingyun Temple. Religious cultur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y the forest community and biodiversity have been protected well.

Key words forest resource conservation , monsoon evergreen broad-leafed forest , religious culture , Dinghu Mountain Biosphere Reserve

Author 's address Dinghu Mountain Forest Ecosystem Research Station , South China Institute of Botany ,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Zhaoqing 526070

鼎湖山森林群落格局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1 2]。研究和探讨鼎湖山森林群落得以保存完好的历史原因时 ,鼎湖山 1300 多年的宗教文化历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同时 ,栖息环境和生境的改变和破坏是导致物种濒危和灭绝的原因之一^[3] ,强调景观系统和自然栖息地的整体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种重要途径^[4]。本文通过现有史料和现存的碑刻 ,就鼎湖山宗教寺庙的兴衰 ,历代寺庙僧人对自然栖息地的保护过程 ,以及宗教文化对鼎湖山森林群落和森林资源保护的影响作一些研究和探讨 ,为南亚热带森林植被的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自然保护区的科学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可供借鉴的经验 ,亦为本地带森林群落动态学研究提供佐证材料。

1 宗教文化的兴衰

“自古名山僧占多”。鼎湖山为岭南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有悠久的宗教文化历史。据《鼎湖山志》记载^[5] :唐仪凤三年(公元 678 年) ,佛教禅宗创始人慧能高僧的弟子智常来鼎湖山 ,

收稿日期 :1998 - 06 - 23 ;修改稿收到日期 :1998 - 12 - 20
^{*} 本文为所长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部分内容

见鼎湖山峰峦叠翠,涧水潺溪,便在鼎湖山的西南面,云溪上游的山顶,云峰麓开山建白云寺(俗称老鼎)。当时佛法初兴,高僧类聚,方圆建有36招提,有供僧俗贸易的罗汉市,其时已初步成为一个以寺庙为主体的宗教、经济活动中心。此后,明万历年间,对白云寺进行了改建和修葺,历时4年,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完工,并改白云寺为鼎湖古寺。后虽经多次修葺,但其结构和布局均维持原貌,现寺门的石匾额“顶湖古寺”四字为明代金山禅师亲手所书。

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鼎湖山附近的迪村人梁少川邀集同信佛教者在莲花峰结社并筹建莲花庵,并于翌年修建佛殿3间,仅为泥石所砌的草房,能蔽风雨而已。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广州高僧栖壑路过端州,慕名鼎湖山水而游鼎湖山,见山势嶙峋,溪流澄湛,遂有开山之志。莲花庵众庵僧亦仰慕栖壑大师大名,而将其迎入山中奉为住持。于是在莲花庵的基础上开始增建堂宇,增大规模,并改莲花庵为庆云寺。从此,鼎湖山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岭南丛林之一。庆云寺建成并开山主法的时间是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清顺次十五年(公元1658年)增建殿堂楼阁,使之成为现在的结构和规模。

或许因为宗教信仰,风水,交通等多种原因,自庆云寺开山主法,香火逐渐兴盛之后,白云寺的香客随之逐步减少,宗教活动的中心向庆云寺转移,白云寺亦随之冷清和败落。至建国前夕,白云寺仅有2~3个僧人打理事务。鼎湖山的宗教寺庙,除了白云寺、庆云寺外,尚有跃龙庵和憩庵。

2 宗教文化与森林资源保护

从鼎湖山宗教寺庙的始兴来看,最早开山主法的是白云寺。即早在距今约1300多年的唐代就有宗教活动。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讲,历代僧人都十分崇尚丛林风水,而寺庙周围的森林无疑是风水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一旦寺庙建立,其周围的山林亦划为寺庙所有,进而对其进行保护和管理,使其免遭砍伐和人为破坏,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白云寺僧人对其周围森林的禁伐保护尚未见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和碑刻留存,在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鼎湖山森林时,白云寺前后的山林仍由其寺内的僧人管理,不属于庆云寺管辖范围。后来由于白云寺随庆云寺开山主法而逐渐衰落,其保护周围山林的能力也随之丧失。从白云寺宗教文化的兴起到庆云寺开山主法,相隔900多年,在此期间,白云寺周围的森林应是受到严格保护的。目前白云寺周围的自然林的林龄无疑是较大的,林中尚有零星的高大古木,如橄榄(*Canarium album*)、锥栗(*Castanopsis chinensis*)等,但林相已破碎,显然是保护不善,曾遭人为破坏所致。

经调查,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内目前所留存的历代与森林资源保护有关的碑刻计有9块,从这些碑刻内容结合有关史料考证:有文字记载的寺庙僧人明确对鼎湖山森林资源进行保护管理始于庆云寺开山主法以后,寺庙僧人及其宗教文化对鼎湖山森林群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植树造林,引种栽培,促进了植被的恢复,保存了种质资源。据鼎湖山庆云寺大殿天井右廊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立的“在■和尚禁伐树木碑”称:“道人于崇禎癸酉年住山,本山只有土坟数堆,原无树木,所有松杉皆由常住工植;五十余载,已成丛林风水之树……。”这里说明了“本山左边”即庆云寺左边的飞水潭一带,原来本无树木,当时的松杉等树木均为僧人所栽种,以致成林。虽然现在由于植被演替或者人为干扰破坏等原因,已难找到当年所种松杉的残迹,但僧人植树育林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立的二代祖塔铭“在■和尚行状”中也曾提到梁少川等人始创莲花庵时的种树情况,即“每冲雪种松,带月锄

荆”。马尾松是南亚热带植被演替的先锋树种之一^[6],植树造林对促进鼎湖山早期植被的恢复,加快植被演替过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是形成目前鼎湖山森林群落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另外,目前鼎湖山保存的百年以上的古树名木中,丹桂(*Osmanthus fragrans* var. *aurantiacus*)、梅(*Prunus mume*)、橄榄、山茶花(*Camellia japonica*)、杨桃(*Averrhoa carambola*)、黄皮(*Clausena lansium*)、龙眼(*Dimocarpus longan*)、人面子(*Dracontomelon duperreanum pierre*)、山荔枝(*Litchi chinensis*)、菩提(*Ficus religiosa*)、木棉(*Bombax malabaricum*)等经济、观赏树木,约有20种30多株集中分布在白云寺、跃龙庵、庆云寺等寺庙的周围,绝大多数为寺内僧人引种栽培。这不仅丰富了鼎湖山的物种多样性,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种质资源。据北京林业大学陈俊愉教授等1983年的调查,全国已知留存300年以上的古梅仅11株,而鼎湖山便占了5株,实为国宝^[7]。一些种类如山荔枝、人面子等经济果树的种子,通过动物和鸟类的传播,在自然林中更新而成为野生种,经过百年以上的生长发育,目前已成为培育和改良新品种的珍贵种质资源。

2) 清规戒约,专职管护,维持了栖息地的完整性,保证了森林群落的正向演替。庆云寺始祖栖壑大师,深通佛法,主张以“戒约为本,禅净为宗”来治理寺庙,他规定该寺任何僧人不得开荒或购置田产,定有“本寺不置田产约”和《僧约十章》等戒约,历代住持均严格遵守并逐步完善这些清规戒约,使之成其为管理寺庙的重要手段之一。现存的碑刻有“栖壑约不置田产碑”、“禁私据寮房公约”以及“重申祖训约”等。虽然,这些清规戒约在当时是出于宗教宗旨和寺庙管理的需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倘使寺庙一旦遭遇不测,僧人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下,阻止了寺庙僧人以种种借口将寺庙财产和周围的山林据为己有,从而毁林开荒,砍伐和盗卖林木资源等。这客观上保护了庆云寺周围的山林免遭人为破坏。相反,白云寺僧人为了维持生计,曾在袈裟田、大窝田一带开荒种地,如今这些地方仍为农田或只有草本和灌木,植被难以恢复,林相破碎,实为最好对比。另一方面,僧人对所辖范围内的林地保护和管理非常具有远见,如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立的“禁滥建和尚塔碑”,明确告诫庆云寺今后各代住持:“本山舆图周围不满十里,求其可营葬者,若前案及两边皆不足问,惟寺后与西、南、北隅数百武地而已。然已建有七塔,除此剩亦不多……。”所以提出:“……今后住持断不宜又建塔埃。何者?以山地有限而住持无穷,使住持或悉别建塔,则不三五百年,而塔盈遍地,是岂可以为法乎?……。”在有限的地域里每增加一座墓塔,必会占地毁林,长此以往,将成为墓地而非丛林风水宝地,栖息地和森林植被受破坏,森林群落结构功能受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要有效地保护好所辖范围内的山林,仅依靠戒约来规范寺庙僧人的行为是远远不够的。从庆云寺早期的“职事榜”可知,寺庙僧人的职位多达70个,而且分工相当明确。在森林的保护管理方面,也有专门的僧人负责。鼎湖山庆云寺客堂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立的“僧众护山碑”上书:“……身任知山,必要铁面,不容私情,即凡寺内居僧亦齐心努力,护卫山场,使勿剪伐,以致濯濯……。”这里的“知山”是指专门负责植树和保护管理山林的僧人。据称,为了使寺庙所辖范围内的林木不被附近居民砍伐破坏以及防止森林火灾,僧人曾在二宝峰、三宝峰顶建简易的住处,作为护林站,日夜守护山林,这种主动的管理形式一直延续到1951年人民政府接管鼎湖山才结束。

从以上分析可知,清规禁令、专职管护,阻止了人为干扰,有效地维持了栖息地的完整性,保证了庆云寺周围的森林群落和森林资源按自然规律进行演替和发展,为形成如今完整的南亚热带植被顶极群落——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划定范围,明令禁伐,形成了自然保护区的雏形,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据“僧众

护山碑”称：“……使其知界内竹木，系佛门有主之物，俗人不可斩伐私取，以伤丛林风水……。”这里所指的“界内”，在当时的范围如何尚无法考证，但显然自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以来，庆云寺的僧人就将庆云寺四周的山林圈定了一定的范围归庆云寺管辖。按庆云寺的规模发展来看，宗教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僧人人数不断增加，更大范围内的山林必然受到更周密的保护。据载，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鼎湖山附近下黄岗白石村人梁荣旦强行砍伐飞水潭附近的林木而与庆云寺僧人引起官司，庆云寺得肇庆知府和道台支持打赢了官司，并获准刻石晓谕禁伐鼎湖山范围内的树木。亦即现鼎湖山庆云寺左侧横门外立的“清政府刻禁伐树木碑”，此碑称：“……鼎湖山庆云寺，左至石仔岭、竹嵩岭、飞水潭、清龙头、并沿坑两旁；右至三宝峰、虎头山，前至百仗岭，后至牵丝过脉等处周围所植树木，均应永远禁封……。”这里明确指出了由庆云寺僧人管理，禁伐保护的山林范围，这一范围约有1000多亩，除了包括目前鼎湖山季风常绿阔叶林在内的自然植被和次生植被的核心区域外，也包括了其外围的部分针阔叶混交林。

对于鼎湖山的森林，庆云寺僧人除划定一定范围禁伐保护外，对禁伐保护的程度亦作了具体的规定，如“僧众护山碑”称：“……一禁男女在界内斩伐竹木并做工；不许带藤筍等物下山；一禁男女在界内采取乾柴；一禁妇女在界内采割牛草……。”这些规定较目前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条例更为严格，真正做到了不受任何人为干扰破坏的全禁封保护，这为保证早期植被恢复，丰富本区域的物种多样性提供了条件。

鼎湖山僧人于1633年所划定的森林禁伐区，无疑是我国早期自然保护区的雏形，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而且禁伐区的范围和保护程度随着宗教文化的兴盛而不断扩大和完善。目前，自然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人民政府1951年从寺庙僧人手中接管鼎湖山的自然林，并于1956年建立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维持了鼎湖山森林资源保护的连续性、有效性。森林禁伐区的兴起，对鼎湖山森林群落的形成及对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4) 争取官府支持，规范保护行动，为森林资源保护提供了保障。虽然僧人早已划定了保护管理的山林范围，但仅仅依靠庆云寺众僧的力量，要完全阻止当地居民对鼎湖山林木的砍伐破坏是不可能的。历代僧人在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方面，积极争取当地官府支持，寻求法律保护，规范保护行动，并树碑警示民众，不能不说是一种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之一。目前鼎湖山庆云寺留存的晓谕民众禁伐森林，保护山林的碑刻中，除了“在■和尚禁伐树木碑”、僧众护山碑外，尚有历代官府立的“清政府禁伐树木碑”、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高要县政府立的“民国政府禁伐树木碑”等。这些碑刻不仅陈述了鼎湖山森林禁封保护的历史缘由，违禁砍伐鼎湖山林木者的官司纠纷及最后败诉的结果，而且强调庆云寺所辖范围内山林已被官府确认并作图存档留后，作为保护管理的法律依据，明文告示民众，庆云寺所辖范围内的山林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占夺砍伐，倘敢违抗，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官府定即严拘究办。这种争取官府支持的作法，其威慑作用显然比单纯的被动保护措施要有效的多。这对目前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仍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由于宗教文化的影响，历代官府和权管通过官文、告示等间接的法律形式来规范保护行动，表明政府对宗教寺庙保护管理鼎湖山森林资源的支持，这是宗教寺庙能维持对所辖范围内的森林保护管理长达319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结语

3.1 鼎湖山的自然林因宗教文化的兴起而开始受到禁伐保护，鼎湖山庆云寺周围的山林明确

受僧人的禁伐保护始于 1633 年,止于 1951 年。鼎湖山的季风常绿阔叶林距今已有 366 年人为禁封保护和管理的历史,其中,庆云寺僧人禁伐保护的历史长达 319 年。1633 年以前,鼎湖山森林和自然环境状况,目前尚缺少可供佐证的历史资料和有关的研究报道。

3.2 从非地带性、非生物影响因子来研究和探讨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的形成机制时,鼎湖山寺庙历代僧人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长期、完善、有效的保护管理措施是形成目前鼎湖山森林群落格局的主要原因之一。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8,9],生态系统受保护的时间越长,生物多样性就越丰富。因此,宗教文化对鼎湖山森林群落的演替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3.3 庆云寺的兴衰命运与其周围森林的禁伐保护程度以及保护的连续性息息相关。据现有的史料和碑刻记载,庆云寺自开山主法到建国前夕,曾遭到过两次重创,即清咸丰十年(公元 1860 年)遭兵燹,全部建筑被焚毁,翌年即募款重修;民国五年(公元 1916 年)庆云寺再次遭火灾,幸得四方乡民抢救及时,只烧毁两隅,后即募款重修,香火依旧。这两次重大火灾是否对周围的森林产生影响,未见有史料和碑刻记载,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在作者的研究过程中,亦未见有史料和碑刻说明庆云寺周围的林木曾遭重大森林火灾,毁林开荒及大面积的人为砍伐林木等恶性事件发生。可以认为,僧人对鼎湖山森林资源的保护管理是连续并且有效的。

3.4 近年来,民族、宗教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以及土著人所掌握的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已引起科学家及国际资助机构的重视^[10-12]。我国宗教文化历史悠久,佛教、道教胜地和名山以及风水林、风水山和龙山、神山等成了目前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生态系统得以较好保护保存的集聚地^[13]。鼎湖山因宗教寺庙的原因而使栖息地及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栖息地的消失和破碎是生物多样性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3,4]。因此,维持自然栖息地的完整性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措施。

致谢 黄玉佳同志参加了部分野外调查工作,肇庆市和高要市档案馆的同志及庆云寺的方丈为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吴厚水,邓汉增,陈华堂等.鼎湖山自然地理特征及其动态分析.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1982,第 1 集:1~10
- 2 任海,彭少麟,刘鸿先.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的成因与研究概况.资源生态环境网络研究动态,1996,7(1):22~25
- 3 陈灵芝主编.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保护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68~69
- 4 俞孔坚,李迪华,段铁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生物多样性,1998,6(3):205~212
- 5 刘明安,张云岭主编.鼎湖山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1993:99~112
- 6 彭少麟著.南亚热带森林群落动态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31~79
- 7 陈彦康.星湖古树名木调查.广东园林,1988(4):12~14
- 8 彭少麟,王伯荪.鼎湖山森林群落分析 I 物种多样性.生态科学,1983(1):11~17
- 9 黄忠良,孔国辉,魏平.鼎湖山植物物种多样性动态.生物多样性,1998,6(2):116~121
- 10 John Mackinnon,汪松.中国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第三年度(1994/5)工作报告.生物多样性,1996,6(1):54~62
- 11 杨昌岩,裴朝锡,龙春林.侗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关系初识.生物多样性,1995,3(1):44~45
- 12 许再富,刘宏茂.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1995,3(3):174~179
- 13 刘德望.引用宗教是保护好野生动植物的有效途径.生物多样性,1996,6(2):123~124